

编委会主任：雷春美 张燮飞 王光远 李祖可 ○

总主编：苏文菁 ○

闽商发展史 ○

· 厦门卷 ○

洪卜仁 周子峰 主编 ○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总 主 编： 苏文菁
副总主编： 许 通 陈 幸 曹宛红 李道振 谢小燕

闽商发展史

· 厦门卷

洪卜仁 周子峰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商发展史.厦门卷/洪卜仁,周子峰主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615-6079-2

I.①闽… II.①洪…②周… III.①商业史-福建省②商业史-厦门市 IV.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8958 号

出 版 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薛鹏志

装帧设计 李夏凌 张雨秋

责任印制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39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253(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 22.5

插页 4

字数 500千字

印数 1~2000册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9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总 序

闽商是孕育于八闽大地并对福建、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巨大贡献和影响的商人群体,是活跃于国际商界的劲旅,是福建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千百年来,为了开拓新天地,闽商奔走四方,闯荡大江南北;漂洋过海,足迹遍及五大洲,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他们以其吃苦耐劳的秉性,超人的胆略,纵横打拼于商海,展示了“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爽义气,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闽商精神,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盛世修史,以史为鉴,利在当下,功在千秋。为了不断丰富闽商文化内涵,更好地打造闽文化品牌形象,持续提升“世界闽商大会”品牌价值,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进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我们把《闽商发展史》研究编纂工作作为闽商文化研究的重大工程,并于2010年8月正式启动。《闽商发展史》全书十五卷,除“总论卷”之外,还包含福建省九个设区市、港、澳、台、海外以及国内异地商会分卷,时间上从福建目前可追溯的文明史开始。2013年6月,我们在第四届世界闽商大会召开前夕出版了《闽商发展史·总论卷》,并以此作为献给大会的贺仪。今天,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还带着淡淡的油墨芳香的是《闽商发展史》各分卷。《闽商发展史·总论卷》和《闽商发展史》各分卷都是《闽商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商发展史·总论卷》的总论注重闽商发展历史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设区市卷和港、澳、台、海外、国内异地商会卷侧重展示闽商发展历史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以丰富的史料与鲜活的案例,为福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文化建设增添了厚实的基础,为中国海洋文化、商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本土的文化基因。

欣逢伟大的时代,是我们每个八闽儿女的幸运;实现伟大的梦想,是我们每个八闽儿女的责任。今后,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深入开展闽商文化研究,以闽商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激励广大闽商,引领弘扬闽商精神,让广大闽商更加积极主动地把爱国热情、创业激情和自身优势转化成实际行动,融入“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的伟大实践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

雷春美

序

厦门商人群体是闽商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闽商的其他商群,他们起步稍晚,却迅速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他们反对封建海禁政策,反对西方殖民经贸掠夺,具有斗争性。他们劈波斩浪,拓展海外贸易,具有开放性。他们敞开胸怀,接纳来自世界各地商人,具有包容性。凡此,都展现和丰富了闽商的精神特质。可以说,厦门商人是闽商中最具代表性的方阵,是极具海洋个性的商人群体。

回顾历史,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国际贸易港口、华侨和台胞出入祖国的重要口岸、福建近代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厦门因港立市,以港兴市,孕育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海洋商业文化,涌现了一批批来自闽省各地及海内外在厦经商兴业的杰出人士。他们筚路蓝缕,开创了厦门、闽南乃至福建的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的先河;他们眼观世界,开启了闽海联系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的经济航道;他们为富而仁,慷慨解囊,倾资兴学,捐资修路;他们是厦门近现代城市框架的主要建设者、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出资者。陈嘉庚、陈纲、洪鸿儒、黄奕住、蔡衍吉、黄长溪、邵庚……一连串令厦门人民骄傲的名字,在闽商发展的历史上熠熠生辉。

进入当代,紧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步伐,厦门新一代闽商继承传统,驰骋商海,义中取利,诚信经营,厦门企业,厦门品质,已经是代表这座城市经济文化现代化水平的一张名片。

厦门闽商群体是闽商精神的重要开创者和实践者,他们身体力行参与美丽厦门建设,一直是推动这座城市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和对外开放的一支重要力量。厦门闽商发展的历程需要我们不断归纳总结、借鉴和传承。

借着世界闽商大会召开的契机,遵照福建省《闽商发展史》的总体编纂要求,《闽商发展史·厦门卷》终于成书。《闽商发展史·厦门卷》是由厦门市委统战部、厦门市工商联组织,并委托厦门地方史专家洪卜仁老先生担纲主编,专门课题组历经数年,广泛征集地方工商史料和学界研究成果,力求基本勾勒厦门闽商发展的历史脉络。全书按照不同时代,分为明清、民国、现代三大篇章,主要包括厦门闽商各个时期的主要经济活动、重要人物事件等,基本追求以史实纪录的方式呈现和印证厦门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发展轨迹。

尊重历史,立足现在,追求未来的进步,值兹《闽商发展史·厦门卷》即将付梓之际,要我写序,谨就所知略述,求教于方家指正。相信闽商发展历史研究和传播,聚焦闽商群体,闽商精神的传承弘扬必定会在建设新福建、新厦门的经济建设活动中进一步升华。

是为序。

中共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黄 菱

前言

福建人具有远洋航海的传统,在大航海时代全球化商贸活动的背景下、在明清朝廷海禁政策时紧时松的情况下,福建商人凭着善于把握时机、勇于拼搏与不畏艰辛的创业精神,于东亚缔造出辉煌的商业帝国。作为闽商的后起之秀,厦门商人既拥有闽商敢于冒险、勇于创业、心怀乡梓的优良特质,其商业活动与海洋的关系又较其他内地闽商集团更加密切。自古以来,海洋哺育厦门城市经济的成长,优良的港口为厦门在大航海时代的崛起提供条件。道光《厦门志》就有这样的描述:厦门“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藪,视汪洋巨浸如衽席”,以港兴商正是厦门商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也为厦门商人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与机遇。本卷旨在从时代背景、厦门商业发展与商人的互动关系以及厦门商人的经营内容三个方面,对厦门商人的业绩进行阐述。

厦门商人崛起于明末清初,清中叶达到鼎盛,鸦片战争后一度衰微。民初,随着近代市政的兴起、海外华侨的踊跃投资,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现辉煌,百业兴旺、市场繁荣,商业城市的发展更加完善。民国二十六年(1937),全面抗战爆发;翌年5月,厦门被日军占领。在日本长达7年5个多月的残酷统治下,民不聊生,市场萧条。民国三十四年(1945)9月,抗战胜利;10月,厦门重光。战后的厦门医治了战争遗留的创伤,华侨陆续回乡投资,经济开始复苏,商业市场呈现一派生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0月17日,厦门解放。在两岸军事对峙的环境下,厦门的工商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逐步恢复和发展。1980年厦门成为经济特区后,城乡市场兴旺繁荣,对外经济蓬勃兴起,厦门商人的发展迈向历史新高。基于上述认识,本卷除绪论与附录外,分为明清篇、民国篇及新中国时期篇三大版块。各篇内容如下:

一、明清篇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开启了欧洲各国在东南亚拓展殖民地的时代,为厦门商人提供了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历史舞台。厦门也在此时期以海上商业城市的姿态崛起,厦门商人如李旦、许心素、郑芝龙以亦盗亦商的身份周旋于西方殖民者与明朝政府之间。其中,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建立的海上贸易王国,在拓展中国对外经贸文化交流与开发台湾方面更是居功厥伟。清廷管辖台湾后,厦门商人活跃于海峡两岸以至东亚。鸦片战争后,厦门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东南亚殖民经济的形成、交通与通讯科技的发展以及西方所带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也为厦门商人带来新机遇,造就了近代厦门城市工商业的繁荣。

二、民国篇

民国初年,华侨资本大量涌入,厦门的商业市场逐渐繁荣起来。到20世纪二三十年

代达到高峰。20 世纪 20 年代,厦门地方人士倡设市政会,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改变了厦门的城市面貌,进而吸引了许多华侨和国内商界人士在厦门投资工商业、房地产、交通和公共事业。市场也因为有华侨频繁进出的消费和侨眷侨属的购买力而重现繁荣景象,带动了金融、航运、建筑、食品工业等相关行业的兴起和发展。

三、新中国时期篇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峡两岸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厦门虽然处于海防前线,但商业仍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及至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创办厦门经济特区,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侨资、台资,扶持民营企业,使厦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功能的现代化中心城市,前景未可限量。

《闽商发展史·厦门卷》是闽商发展史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对一些问题提出了不成熟的看法,有待于今后的继续探索,期待能够得到专家、读者的不吝指教。

洪卜仁

2016 年 4 月

目录

contents



绪论 厦门商业城市的成长/1

第一篇 明清时期活跃在海上丝路的厦门商人与海上贸易

第一章 厦门的兴起与海上贸易的活跃/14

第一节 明代厦门商业地位的确立/14

第二节 李旦、许心素等厦门海商的兴起/16

第三节 郑氏家族的海上贸易王国/18

一、郑芝龙时代/19

二、郑成功与郑经时代/22

第二章 厦门商人与对外贸易的发展/27

第一节 厦门商人与西方人的贸易/27

一、厦门商人与葡萄牙人的贸易/27

二、厦门商人与西班牙人的贸易/28

三、厦门商人与荷兰人的贸易/28

四、厦门商人与英国人的贸易/30

第二节 厦门商人与东南亚的贸易/31

一、厦门商人与暹罗的贸易/32

二、厦门商人与吕宋的贸易/37

三、厦门商人与苏禄的贸易/44

四、厦门商人与噶喇吧的贸易/46

五、厦门商人与新加坡的贸易/48

第三节 厦门商人与日本的贸易/48

第三章 清代厦门商人与国内外贸易的嬗变/51

第一节 清初海上贸易政策对厦门海商的影响/51

一、海禁与弛禁的不同局面/51

二、繁盛的商业贸易都会/53

第二节 厦门开埠与中外贸易体系的改变/56

一、开埠通商与不平等贸易/56

二、日本对厦贸易的畸形增长/58

第三节 清末厦门对外贸易的新趋势/59

一、厦门对外贸易的长期入超/59

二、厦门商业在世界市场的跌落/61

三、厦门对台转口贸易的增长/63

第四章 厦门商人社团——厦门商务总会的创立/67

第一节 厦门地区行郊商人组织的兴衰/67

一、厦门的洋行/67

二、厦门的商行/68

三、厦门的途郊/68

第二节 厦门商务总会/70

一、厦门商务总会的成立/70

二、厦门商务总会的作用/73

三、清末厦门商业名人/80

第二篇 民国时期厦门的商人与商业网络

第五章 民国时期厦门的商人与商业发展/84

第一节 厦门的市政建设运动与商业发展/84

一、厦门的市政建设运动/84

二、民国时期厦门商业的发展阶段/86

第二节 民国时期厦门商业的类型和特色/86

一、厦门商业的主要类型/86

二、厦门商业的基本特色/89

第六章 民国时期厦门工商业的繁荣/93

第一节 民国时期厦门的主要行业/93

一、民国时期厦门的钱庄业/93

二、民国时期厦门的银行业/97

三、民国时期厦门的侨批业/104

四、民国时期厦门的房地产业/110

- 五、民国时期厦门的交通运输业/116
- 六、民国时期厦门的进出口贸易/127
- 七、民国时期厦门的六途业/129
- 八、民国时期厦门的粮食业/135
- 九、民国时期厦门的茶叶业/136
- 十、民国时期厦门的百货绸布业/139

第二节 民国时期厦门的工业与手工业/145

- 一、民国时期厦门的造船工业/145
- 二、民国时期厦门的食品业/147
- 三、民国时期厦门的纺织业/149

第三节 民国时期厦门的商办公用事业/151

- 一、电话/151
- 二、电灯电力/153
- 三、自来水/157
- 四、城市公共交通/160

第四节 民国时期厦门的服务业/162

- 一、民国时期厦门的旅馆客栈业/163
- 二、民国时期厦门的餐饮业/166
- 三、民国时期厦门的休闲娱乐业/168

第七章 民国时期厦门商会组织的沿革/172

第一节 厦门商务总会的改组和演变/172

- 一、从厦门商务总会到厦门市商会/172
- 二、厦门总商会职能的变革/181
- 三、分裂商人社团的厦门商民协会/185

第二节 民国时期厦门的商业名人和商号名录/186

- 一、民国时期厦门商业名人/186
- 二、抗战前厦门主要工商业名录/188

第三篇 新中国时期的厦门工商业

第八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厦门的国民经济恢复/216

第一节 海防前线的反封锁/216

- 一、反封锁、反禁运斗争/216
- 二、外贸经济的复苏/234

第二节 厦门工商企业的调整和改造/236

- 一、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36
- 二、厦门商业网点和商业中心的变迁/237
- 第三节 1949—1966 年厦门的工业发展/238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厦门的工业/238
 -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与厦门工业建设/239
 - 三、厦门工业体系的形成/240
 - 四、1949—1966 年厦门对外贸易的发展/242

第九章 改革开放中的厦门工商业/244

- 第一节 厦门经济特区和厦门工商业的发展/244
 - 一、经济特区的成立和特区工商业的起步/244
 - 二、经济特区的发展阶段/246
 - 三、经济特区的腾飞/247
 - 四、改革开放以来厦门工商业的发展成就/247
- 第二节 厦门民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249
 - 一、个体经济的恢复/249
 - 二、私营经济的增长/249
 - 三、改革开放以来厦门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成就/251
- 第三节 厦门的投资开发区/251
 - 一、台商投资区/252
 - 二、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254
 - 三、象屿保税区/254

第十章 新中国时期厦门工商业的辉煌成就/256

- 第一节 厦门的工业/256
 - 一、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257
 - 二、机械冶金工业/259
 - 三、化学医药工业/261
 - 四、食品加工业/263
- 第二节 厦门的金融业与房地产业/265
 - 一、厦门的金融业/265
 - 二、厦门的房地产业/269
- 第三节 厦门的旅游业与服务业/271
 - 一、旅游住宿业 326/271
 - 二、餐饮业/274
 - 三、休闲娱乐业/281
 - 四、会展业/282

第四节 厦门的运输业与物流业/286

一、航运业/287

二、陆路运输业/290

三、航空业/293

四、现代物流产业/294

第五节 厦门的批发业与零售业/295

一、商业圈和大型购物中心/296

二、城乡集贸批发市场/303

第十一章 厦门市工商业联合会的诞生和成长/306

第一节 厦门市工商业联合会的设置/306

一、厦门市工商联的成立和展开/306

二、厦门市工商联的职能变迁/307

三、厦门市工商联(厦门总商会)历届主要领导成员/308

第二节 厦门市工商联的主要工作/312

一、服务经济建设/312

二、参与政治活动/314

三、开展海外联络/316

第三节 厦门百强企业名录(2006—2010)/322

一、2006年厦门企业100强/322

二、2007年厦门企业100强/324

三、2008年厦门企业100强/326

四、2009年厦门企业100强/328

五、2010年厦门企业100强/329

参考文献/332

后 记/345

绪 论

厦门商业城市的成长

厦门是福建省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闽南的区域经济中心。地处福建省南部九龙江出海口,背靠闽南大陆的漳州、泉州平原,濒临台湾海峡,与金门一衣带水,和台湾本岛、澎湖列岛隔海相望。厦门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商业城市,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也是侨胞、台胞的主要祖籍地和出入祖国的主要门户。

自唐宋以来,厦门即与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宋代称厦门岛为嘉禾屿,此后一直到民国建立前,厦门是泉州府同安县管辖的一部分。此时岛上已有五通(遗址至今犹存)、东渡(今已不存)两处官渡。南宋末年,宋帝赵昴经东渡码头逃至潮州,可见厦门在宋代已是闽南海陆交通的其中一个中转站。

一、厦门海商的崛起

明洪武年间,厦门城竣工。明中后期,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发展迅速,明廷碍于形势与财政需要,在漳州府海澄县月港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到国外贸易。厦门湾乃漳州海道门户,当时华南水域海盗猖獗,厦门岛上有官兵驻扎,能为沿海商船提供较大保护,加上商船从远洋驶回月港,需在驶入月港前寻找港口进行补给与维修,厦门作为贸易港的地位逐渐形成。16世纪地理大发现,葡萄牙等欧洲国家来到厦门港附近的浯屿等岛屿进行贸易,开启了厦门商人和西方商人之间的接触。明末,厦门取代月港,成为闽南地区贸易的中心。海商李旦与厦门的许心素合作,由许氏在大陆收集中国货物,运至台湾交与李旦行贩日本,形成厦门与日本间的经贸关系。

明末清初厦门著于史籍,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有密切关系。天启七年(1627),郑芝龙入据厦门。顺治三年(1646),厦门与金门两岛为海商郑彩、郑联(今集美高浦商人)兄弟所据。顺治七年(1650),郑成功在厦门袭杀郑联,顺治十二年(1655)易厦门之名为思明州,设海商义字行从事海上贸易,从此以厦门、金门作为抗清复明、驱荷复台的根据地,同时也是郑氏航海贸易的大本营。明末清初的民族战争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严重的破坏,而厦门却因为郑成功沿袭其父辈的海上贸易大业,出现了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繁盛景象。郑成功在厦期间,每年派到日本贸易的船只估计约30艘,派到东南亚贸易的船只约16艘到20艘。

郑成功家族从事航海贸易期间,厦门也已有来厦经营贩洋贸易的外商。康熙九年(1670),英国东印度公司派来厦门贸易的第一艘商船万担·宾克号(Bantam Pink)进港。康熙十五年(1676),该公司正式在厦门建立商馆。1681年8月13日,东印度公司伦敦总公司董事在给郑成功之子郑经的信中,表达了扩大贸易的愿望,并希望“厦门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台湾重新纳入中国版图。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设台湾厦门兵备道,统一管辖厦台两地军政和经济事务;同年解除海禁,在厦门等四个港口设立海关,征收关税。

二、厦门商业网络的形成

闽南地区的海洋商业传统孕育了厦门商人的成长;厦门城市经济的发展,则为厦门商人提供了一显身手的舞台。清代厦门商业发达,与中国沿海城市及东南亚建立了广泛的商贸关系,此即新加坡学者吴振强教授在《厦门的兴起》一书中所称的“厦门网络”^①。

先言闽南居民的开拓精神。闽南居民致力于商业活动与航海事业的原因,可从推力与拉力(push-pull)两种因素予以解释。推力因素方面,闽南农村人地比例失调及地主对农民的压迫,驱使农村人口大量外移,增强人民从事商业活动的愿望;拉力因素方面,商业经济活动所带来的丰厚利润,吸引了企图追求更美好生活的人从事商业活动,是以“闽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嗜利走死习以为常”^②。

其次,厦门网络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汉人对台湾的开发。郑芝龙经营台湾与荷兰殖民台湾时期,两者都招徕闽粤移民入台垦殖。清初,跟随郑成功到台湾的军人及其眷属有数万人。清廷统一台湾初期,施琅禁止广东移民渡台,造成康熙年间闽南移民在台湾一枝独秀的局面,闽台贸易活动自然掌握在以厦门为基地的闽南海商手上。到乾隆中叶,台湾汉人数量已达100万左右。

第三,闽南居民的开拓精神为闽南海上贸易带来了强劲的原动力。明末以来,东南亚与闽南地区的经济关系日渐加强,为闽南商人带来机遇。明代中叶以后,闽南地区的人口压力日趋严重,部分人口相继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活动。华商从东南亚输入大米、香料等当地土产与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与陶瓷等特产,构成中国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的桥梁,清代厦门网络即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延续。

明末以后,闽南地区海上贸易日趋繁盛,厦门能够脱颖而出、进而成为清代中叶福建沿海第一大港的原因,除厦门自身的港口优势外,实为清廷的海防与商贸政策所致。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立台厦兵备道以来,清廷只开放厦门港对渡台湾的鹿耳门港,为

^① Ng Chin-keong,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② (清)王澐:《闽游纪略》,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第11册,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重印本,第104页。

两岸来往的唯一通道达 100 年。台湾与厦门联为一体,往来更加密切。一些厦门商人移居台湾,从事两岸贸易,从厦商变成台商。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廷才增开晋江蚶江与台湾鹿港间的对渡。

三、厦门商人的国内外贸易

厦门作为闽南政治、商贸、文化中心,已有 280 多年的历史。雍正五年(1727),清廷将原设泉州的兴泉兵备道衙门移驻厦门。雍正十二年(1734),又增划永春直隶州归兴泉道,改称兴泉永兵备道。清代,在省与府之间设立了道一级的行政权力,相当于民国时期的行政专署。厦门非县衙、府衙所在地,清廷之所以在这里设置道署、委派正四品道员掌管,不外乎就是因为厦门作为商业与战略价值的海外贸易中心,具有中心地位。此时的厦门已是福建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清代厦门商人的足迹遍及东南沿海,北至锦州、天津,南至广州、香港。厦门商人从东南沿海运出土产品如糖等至北方沿海口岸,从北方运回豆饼与土产回闽发卖。台湾更是闽南商人的活跃区域。时人黄叔瓚谓:

海船多漳、泉商贾,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漳纱、翦绒、纸料、烟、布、草席、砖瓦、小杉料、镛铛、雨伞、柑、柚、青果、橘饼、柿饼。泉州则载磁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干笋、香菇。回时载米、麦、菽、豆、黑白糖、饴、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诸海口。^①

台湾与厦门的经济联系也可以从台湾地区专门从事对大陆贸易行郊组织的兴盛中得到证明。嘉庆年间,鹿港有所谓八郊,其中厦郊专门从事与厦门、金门、漳州地区的贸易,所属商号共百余家,也有兼营布郊、糖郊、染郊者。因此可以这么说:在这一历史时期,闽商包含厦商与台商。鸦片战争后,厦门与台湾仍保持密切的经济往来。《厦门海关十年(1882—1891 年)报告》中明确指出,“厦门一直是运往台湾货物的集散地。台湾的贸易往来大部分经过本口岸”。“1881 年经厦门港转入大陆的台湾乌龙茶,与过去的任何一年相比,数量是最多的。”甲午战争后,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在此期间,厦门与台湾的贸易不再是国内的区域贸易而转化为对外贸易,且走私贸易极为猖獗。

清代厦门对外贸易的繁荣,刺激了市区人口的增长以及都市商业功能的扩张。乾隆年间,厦门街道约有 25 条,光绪三十四年(1908)发展至 220 多条。清代厦门因商贸和航运事业的发展出现了航运码头的区域集中化和专业化分工,十三个路头的形成正是此种趋向的表现,市区商业活动多集中在十三个路头附近进行。从道光十五年(1835)至宣统三年(1911),厦门商业市场最繁荣的是洪本部一带,主要是批发商和经营海上贸易的大行郊;另一个是寮仔后(今水仙路一带),菜馆、旅栈、侨批局、钱庄、日用品商店、戏园等行业都集中在这里。洋商、洋行、银行、保险则主要分布在番仔街、镇邦街、港仔口、新路街

^① (清)黄叔瓚:《台海使槎录》卷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1996 年版,第 47 页。

一带。“近城烟雨千家市,绕岸风樯百货居”正是对当时厦门商业繁荣景象的写照。此时的厦门,已从一个半渔半耕的小岛成为“市肆繁华,乡村绣落,不减通都大邑之风”的商业城市。18世纪初,法国耶稣会教士杜霍尔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其《中华帝国全志》中认为厦门是“世界上最好的港口之一……可容纳千艘船舶,且为一深水良港,最大的船舶亦可直抵岸边”。在《IN AND ABOUT AMOY》一书中,美国人毕腓力(Philip Wilson. Pitcher)写道:“厦门是中国的一个贸易中心,有着无比优越的港口,很早以前就为西方的旅行者和商人所熟悉”。

鸦片战争前后,有一位外国人在他的著作中写道:

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像厦门那样聚集了这许多有钱的能干的商人。他们分散在整个中国沿海各地,并且在东印度群岛的许多地方开设了商号。……他们最短的航行是去台湾……在西南季节风的时候,他们的船只在厦门装载砂糖,运到北方各港口出售,主要是宁波、上海、天津以及东北各城市,回程则载运豆类与药材。他们在江南的苏州府和定海等城镇以及广州之间,也进行大宗贸易。

对外贸易的极大部分由厦门地方的一些资本家所经营的。他们在马尼拉虽然遇到极高的关税……但他们和这个岛屿依然继续维持着商务关系。他们和东京及印度支那半岛的贸易并不多,但是每年也至少有四十艘大帆船前往暹罗的曼谷。前往婆罗洲、孟加锡、巴达维亚以及苏禄群岛去的福建帆船都是最大型的,其中有的载重达一万二千担,即将近八百吨,他们在这些地方大量装载一般称为“海峡土产”的货物。……

地方政府非正规的勒索性的苛征暴敛,近年来使得厦门的许多大商人迁移到上海、广州以及其他地方去了。他们在那里利用从家乡随来的船只和人员经营贸易。^①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被辟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为厦门的商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使过去厦门的对外经贸关系出现巨大转变,刺激了厦门自身商业结构的转型,为厦门商人提供了更多一展身手的机会。

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为满足通商和推销本国工业产品的需要,必须加强各东亚商业中心与欧美各国的联系。首要工作是引入西方近代交通和通讯科技,建立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交通网络。

此后,不少经营帆船贸易的东南亚闽南商人转而从事轮船航运,如新加坡的薛荣樾、邱忠波等人。19世纪70年代,盛宣怀创办的中国轮船招商局也参与厦门的航运事业。至20世纪初期,帆船的沿海埠际客运业务已大部分被轮船取代,近代厦门轮船运输网络宣告完成。

^① Lindsay: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1833, pp. 13~15. 转引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第五种,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通讯事业方面,同治十年(1871)大北电报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mpany)在上海与香港间铺设电缆。次年,该公司将厦门和上海及香港部分的电缆连接起来,厦门可透过电报与欧美市场联系。随后,大北电报公司建成两条通往福州和鼓浪屿的电报线。光绪十三年(1887)至光绪三十年(1904)间,泉州、漳州、云霄、诏安等地电报业务相继开展^①,确立了厦门作为闽南地区通讯中心的地位。

西方近代交通、通讯事业对厦门商业的发展影响深远。20世纪初,厦门和闽南以外城市间的旅客流量达到16万人次以上。新式通讯事业则加速了东亚各城市间的信息交流,配合汇票、汇款单、银行支票等新式交易手段扩大了商业信贷的使用,促成区域市场整合,产生跨地域的金融体系。埠际金融流动的活跃,使流入厦门金融市场的资金不断增加。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宣统三年(1911)间,市场资本额从1000万元增至2200万元^②,奠定了20世纪上半叶厦门作为华南侨汇中心的地位。

四、侨资与市政建设助力厦门商圈的确立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的统治,厦门光复。民国元年(1912)4月,厦门与金门从同安县析出,设置思明县。民国四年(1915)元旦,金门从厦门分出,另置金门县。

民国二年(1913),北洋军阀势力伸入福建,地方军政大权落入北洋军阀手中。民国三年(1914)5月,皖系北洋军阀的福建督军李厚基派其部属唐国谟为厦门镇守使,北洋军阀在厦门的统治由此开始。此后又历经童保暄、潘国纲、臧致平、杨树庄、林国赓等人的统治。其中在臧致平统治时期,经过数月的罗掘,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③。海军司令杨树庄垂涎于厦门,利用臧致平失去靠山和厦门人民日益滋长的反臧情绪,于民国十二年(1923)6月率军舰攻打臧军,图占厦门未遂。其后,海军通过和臧致平进行政治交易,于民国十三年(1924)4月兵不血刃进驻厦门,掌握统治大权。海军为了扩大地盘、增加饷银,就必须设法开辟财源。民国十三年(1924),时任海军司令的林国赓拉拢一批官僚政客,联系地方商绅和华侨富商,筹划建设厦门新城区。从此,厦门掀起了开辟马路、建设商业楼房的第一波热潮,岛上西南部滨海地带次第出现一幢幢洋楼,开元路、大同路、中山路、思明东西南北路、升平路、海后路都在这一时期先后建成。港口城市建设的触角从岛美路头延伸到传统街区。堤岸、公园等市政设施相继建成,商业中心由最初的开元路移至大同路。

民国初年,华侨资本大量涌入,厦门的商业市场逐渐繁荣起来。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至鼎盛时期。20世纪初,厦门已经有了电灯、电话、电报;到了20世纪20年代,厦门地方人士倡议市政会,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扩展市区面积,兴建街道、楼房、店铺、货栈、码头、市场、公园、公共交通、自来水公司,改变了厦门的城市面貌,促进了商业鼎

①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 1902—1911, p. 106.

②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 1902—1911, p. 104.

③ 《晨报》(北京),1923年11月10日。